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輯

沈雲龍 主編

抗戰十年之前之中國

(一九二七—一九三六)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目 次

十年來的中國統一運動	潘公展	(1)
十年來的中國政治建設	蔣孟武	(21)
十年來的中國外交	吳頤寰	(27)
十年來的中國法制改革	孫科	(53)
十年來的中國司法界	居正	(69)
十年來的中國金融與財政	孔祥熙	(93)
十年來的中國工業	馬寅初	(119)
十年來的中國經濟建設	羅敦偉	(145)
十年來的中國農業	朱義農	(185)
十年來的中國國際貿易	武靖幹	(211)
十年來的中國航空建設	周至柔	(263)

十年來的中國鐵道建設	張嘉璈	(271)
十年來的中國航運	蔡增基	(291)
十年來的中國水利建設	李儀祉	(317)
十年來的中國電信事業	俞飛鵬	(365)
十年來的中國鄉村建設	晏陽初	(405)
十年來的中國醫藥衛生	劉瑞恆	(421)
十年來的中國合作運動	陳果夫	(447)
十年來的中國出版事業	王雲五	(463)
十年來的中國新聞事業	邵力子	(481)
十年來的中國高等教育	黃建中	(503)
十年來的中國中等教育	周佛海	(531)
十年來的中國初等教育	顧樹森	(559)
十年來的中國社會教育	蔣建白	(585)
十年來的中國體育	沈嗣良	(607)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界	全增嘏	(623)
十年來的中國科學界	胡敦復	(631)
十年來的中國考古學	衛聚賢	(637)
十年來的中國文藝	傅東華	(659)
十年來的中國美術	葉恭綽	(687)
十年來的中國廣播事業	吳保豐	(693)
十年來的中國戲劇	洪深	(739)
十年來的中國音樂研究	蕭友梅	(749)
編輯後記	樊仲雲	

十年來的中國統一運動

潘公展

— 引言

在最近的十年間，中國政治形態，顯有劇烈的轉變；最初是國民革命軍掃蕩封建軍閥的戰爭，繼為封建殘餘勢力披上革命新裝來對抗革命的鬪爭；最後乃為平定共匪的長時期的戰爭。在這期間，中有九一八、一二八等事變，外侮之烈，非言可喻，然而卒能於萬難之中，肅清割據勢力，完成全國統一，總理主義的深入人心，固其要因，而蔣委員長之領導有方，尤當特筆大書焉。

中國本是次殖民地的國家，蜘蛛網似的列強勢力交錯於整個的中國，列強為着取得在中國的優勢，往往伸出干涉的魔手，阻止中國革命的發展，封建餘孽和共產黨等，因為自身敵不過新興的革命勢力，也樂於假借外力來自保，因此，這十年間中國的內憂雖不完全都和外患聯成不可分的一環，但卻有一大部分的內憂實際上是種因於外患，而革命統一的勝利，其本質也無異是對外的勝利，並不是對內的勝利。在這種實質的對外的

勝利中，中國所付代價之鉅大是自從有歷史以來所不曾聞見的。所以這種勝利可說是寶貴無比的勝利，並且是每一個國民都應該誓以生命財產來保持的。

又不僅該保持目前的勝利而已，還有更進一步取得更大勝利的必要。因為目前勝利的結果，雖已從中國一大部分領土內逐出外來的壓力，但還有若干地方不會擰脫外來的壓力，這些不會擰脫外來壓力的地方，依然形成一特殊的地帶，在實質上不能算是真正統一國家的一部；同時冀東、察北和東北四省，斷沒有可任人終古佔領的理由，尤須速為收回的準備；而驅逐外來壓力及收回失地的惟一方法，就是力求勝利的擴大；我們若不更進一步爭取比目前更大的勝利，那就不僅冀東、察北和東北四省不知何年何月方可收回，就是那些不會擰脫外來壓力的地方，也有繼冀東、察北而淪陷的危險。至所謂更大的勝利，換一句話來說，就是求得整個國家更健實更完全的統一。因統一本身就是勝利，能統一然後能取得勝利。

至於如何始能完成真正的統一，這雖是一個問題，但若我們不忘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那麼這問題便不愁無法解決。就最近十年間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來說，約可分為三點：其一，名為對外實則對內的任何行動，都是徒損國力無裨國難的行動，只有團結內部充實國防的措施，纔是真正增加國力排除國難的行動。其二，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類，都不是現階段中國的需要，現階段中國的需要，只有惟一的三民主義。其三，對於假借外力以自固的任何反動勢力，如果全國上下肯用像去年綏邊抗戰同樣的手段來應付，那他們就

永沒有逞志的時候，同時援助這種惡勢力的外力也必然遭受極大的打擊。歷史的教訓如此，那完成真正統一的前提，不消說便是努力遏止一切假名抗禦外侮而志在製造內亂的企圖，溝通各種知識份子的意志而使之共信中國所需要的三民主義，撲滅漢奸的勢力了。

二 十年來的黨務統一運動

國民黨民十三改組以後，被收容的共產黨爲數頗多，總理逝世以還，共產黨便有篡黨的企圖，當以國民黨中有自命左傾而與共產黨緊密提攜不惜拋棄三民主義而就共產主義的分子，於是整個的國民黨遂裂而爲數團，彼此意見，恆相矛盾，而齟齬亦因之以起。十四年十一月國民黨撤鄒魯先生外交代表職務，及張繼先生召集西山會議反對共產派，及十五年四月蔣介石先生勸令共產派取消青年軍人聯合會，並令取消孫文主義學會，均爲黨中各派已不能相安的徵象。其後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整理黨務案，重新登記黨員，共產黨乘機操縱，大佔優勢，黨的分裂，乃日形顯著。結果，十五年十一月遂有重慶國民黨左右派爭鬪流血的慘劇發生，重慶流血慘劇發生以後，共產黨鑒於國民黨已中分化之毒，更加緊其拆散國民黨的步驟，到得十六年北伐軍發展至上海、南京的時節，黨內便形成了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聯合而對抗中央的局面，而中央就也不得出清黨的手段來轉移這種喧賓奪主的形勢了。

當中央開始清黨的時節，形勢的險惡，幾無以復加。中央監委蔡元培、吳稚暉先生等提出檢舉共產黨案的墨瀋未乾，左派和共產黨的合作宣言隨而發出，滬、粵、閩、浙正大舉清黨，武漢左派卻有採取某種行動來牽制正統派的企圖。後來左派雖因汪精衛先生的護黨態度漸次鮮明，也有清黨的行動，但仍不願與中央合作，初則不承認南京的中央，繼又有東征的決議，致造成寧漢對峙之局，直到是年十二月中央委員全體集議於上海，纔算勉強成立合作，但仍得不到切實的諒解。在這期間，剷除軍閥的軍事雖沒有完全停頓，但因為黨的分裂日趨顯著，軍的勢力也分為兩大派流，意見既不一致，指揮也不如意，實有為軍閥所乘而歸於失敗的可能。

此後中央為着貫澈清黨主張起見，曾陸續採取如下的措置。十七年一月，中央黨部停止鄂、湘、閩、皖、漢五省的黨部活動，並派員接收蘇、浙兩省黨部，以資整頓。二月，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又議決四案：（一）改組中央黨部，（二）整理地方黨部，（三）整理特別黨部，（四）改組國民政府，（五）改組政治及軍事兩委員會，（六）取消聯俄容共政策。十一月，中央黨部更發布防共連坐法，並禁止各級黨部對外發表宣言。十八年一月，中央確定反動與腐化之標準，規定專門以上學校黨義教師檢定辦法；三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修改國民黨總章，並開除李濟深等之黨籍；五月，中央監委會決定北平市及山東省黨指委全體撤職；七月，中常會議決改組四川、綏遠、天津黨務機關；八月，派員整理河北省黨務；十月，議決廢止黨員背誓條例，另由立法院制定黨員犯罪加重法，派員整理廣西黨務，並通過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十一月通過訓練

預備黨員的原則；十二月整理江蘇黨務，並開除醞釀擴大會議派的黨籍。

經過這種種的處置和整理之後，黨內不純粹的分子雖略告肅清，然因左派若干分子的不滿，竟復發生了十九年八月擴大會議的事變。及擴大會議隨閣、馮的通電願釋兵權而解體，黨的糾紛本可完全解決，然不幸到了二十年的三月，又以胡漢民的不滿國民會議的辦法而發生廣東黨務脫離中央之變，一直繼續到陳濟棠由廣州出奔，西南執委會宣言取消新國民黨無形消滅，黨的統一纔成爲不可動搖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黨務統一運動的過程中，最使人感到煩悶的有下面幾種現象：其一，共產黨分化國民黨的魔手，時時伸到黨內，而黨內一部分意志薄弱的黨員，又往往以所謂某派某派自居，分出許多小組織，因而黨的思想的整個基礎，時呈動搖現象。其二，披上黨員新裝的封建餘孽，腐化官僚，不逞政客，隨時隨地都有出現原形的可能，以致稱兵割據的人物，幾乎多半是黨內的分子，從表面看去，黨的樂與人爲善的態度未免過於寬濫。其三，黨內的爭端有時祇是爲爭做領袖和爭地盤而起，但亦必假對外的名義爲爭做領袖和爭地盤的掩護物，貽笑敵人，莫此爲甚。其四，國的統一以黨的統一爲前提，黨的分裂將更促成國的分裂，在國難那樣嚴重的期間，黨內的爭端竟不易終息，實足使一切盼望國家統一的人們感到非常的失望。自經西安事變，這種現象幸已一掃而空，除了極少數人外，全黨都已公認了一個重心，國民精神也倍見團結，這是可爲我國前途慶的。

三 十年來的政治統一運動

黨務統一的經過，既如上述，政治統一的經過，就當然更呈一波三折的奇觀了。

說到政治的統一，似乎應該從民十五廣州國民政府政治委員會通過兩粵統一案說起，因為那時節以前不僅全國的政治無統一可言，連兩粵也還談不到統一，國府政委會統一兩粵的企圖，實是中國統一的第一聲。那時候的中國，政治是多頭的，南方的國民政府，統治了兩粵，北方的段氏執政府，統治着北平一市，東四省有張作霖的政權，豫、鄂、湘有吳佩孚的政權，東南五省有孫傳芳的政權，河北、山東有張宗昌的政權，察哈爾、綏遠有馮玉祥的政權，其他雲、貴、晉、新等處，也都有獨立的政權，封建形態的發展，可謂已經盡其能事。國民政府是年二月任蔣介石先生為國民革命軍總監，雖就是準備收拾這種軍閥混戰的時局，但因為兩粵自身還欠統一，談不到統一全國，乃先以上述的議決案統一兩粵，求以統一兩粵的陣容，收統一全中國的效果。所以這個統一兩粵的決議，也就是後來中國真個歸於統一的基礎。

在中國統一的過程中，內則軍閥割據，此仆彼起，悍將稱兵，自擁團結，共匪騷擾，動搖大局，漢奸媚外，引狼入室，外則強敵窺伺，有隙即乘，五三濟南之變，既使革命軍不能一鼓作氣直下幽燕，後來則變本加厲，復有九一八的佔領東三省，一二八的轟炸上海，二十一年的進佔熱河，以及策動偽軍，進佔察北，嗾使漢奸，盤踞冀東，煽動蒙

僞，進竊遠，收買奸民，運動自治，暨以武裝包庇走私等事實，中國之不至因此而土崩瓦解者，其間真不能容一
髮，而能於這種不容一髮的危局中，使中國轉危爲安，卒到達此日雖不十分完全而大部分確已真正統一者，實
由於民族領袖 蔡委員長堅苦卓絕的偉大精神，今請臚舉十年來中國統一的事實，來證明上項斷案的正確。

民國十五年七月，蔣介石先生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誓師北伐之後，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各省代表的聯
席會即於十月議決以實現全國政治上經濟上的統一爲最近政綱，這是國民黨於統一兩粵後意欲統一全國
的最鮮明的表示。當時國民黨所以有這種表示，是因爲蔣介石先生所統的革命軍所向無敵，出師僅兩月有奇，
便收拾了湘、鄂、贛三省，並予吳佩孚、孫傳芳以重創，預計可於最短期內統一全國的緣故。不過國民黨當時雖有
於最短期內統一全國的企圖，而因內部分裂爲正統派、左派、右派、共產派的緣故，就不僅不能舉全力爲革命軍
的後盾，並且還有因意見不同而在後方搗亂的事實。像當時陳獨秀的反對出兵，及十六年三月七日中央執監
會在漢開會，公然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並迫使陳銘樞、劉文島去職，以及脅迫駐兵上海的薛岳欲使其叛黨等
等，就都是前方軍事正在發展，而後方則大受反對派搗亂的事例。幸而當時在前方指揮軍事的是堅苦卓絕不
辭任何險阻艱難的蔣介石先生，所以儘管後方已經動搖，而前方則仍能儘量發展，革命軍所到的地方，恍似秋
風掃落葉，不會感到任何的困難，卒能以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實現了總理生前的意志。倘當時不是蔣介石
先生指揮前方的軍事，而指揮前方軍事者竟是一個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人物，那就必然會因後方有變而遲

疑卻顧，不知所措，陷於進退失據的窮境，而革命史的展開也至少要遲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期間了。

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之後，北伐軍便沿着津浦路綫推進，到了五月一日入了濟南，本可一鼓而下平津，但日本因革命軍統一中國之後，日本的大陸政策將無從實現，於是便在濟南發動五三的事變，迫使革命軍後退，以便張宗昌、孫傳芳的反攻。因此革命軍除一部分繞道攻至德州以外，其大部分就只能與張、孫的軍隊相持於泰安一帶，延至八月，寧漢決裂，武漢方面組織東征軍，將攻南京，蔣介石先生以革命軍正遭外力壓迫，大部不克北進，一部雖繞道前進，攻克德州，亦不能進展，且受張宗昌、孫傳芳之反攻，若內部發生戰爭，勢將全部同歸於盡，乃以八月十五日自動宣告下野，一以表示出處之光明，一以促成寧漢之合作。蔣介石先生既下野，武漢政府便遷併於南京，孫傳芳即於此迫令李寶章、段承澤、鄭俊彥等大舉反攻，夜渡長江，進據龍潭，爲捲土重來之計，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劉峙、衛立煌、夏威等，以此役至關重要，乃會同楊樹莊所統之海軍，猛攻黃龍山之孫軍，擊斃孫軍精銳約萬人，俘獲萬餘人，一舉殲盡渡江之敵，而南京亦遂轉危爲安。

龍潭戰後，革命軍決分三路前進，以李宗仁指揮中路向徐州追攻，以唐生智指揮左路包抄蚌埠，以何應欽指揮右路循運河向魯南進攻，但以各路的合作未臻緊密，與閻馮兩軍間的呼應也不甚靈敏，所以不能迅速發展，直至十七年一月蔣介石先生復任總司令，北伐軍事纔又復呈活潑的狀態。

同年二月，國府改任蔣介石先生爲軍委會主席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任馮、閻爲二三集團軍總司令，蔣介

石先生即積極布置津浦綫方面的軍事，與馮、閻兩軍緊密合作，當三月底馮、閻兩軍和奉軍開始主力戰的時節，第一集團軍也開始津浦全線的總攻擊，至五月第一集團軍復克濟南，與馮軍會於大河之南，晉軍轉守為攻，西北路出偏關，抵歸綏；北路出雁門關，進佔大同，中路直趨深源、阜平；東路連下石家莊、正定，奉軍至此，已呈不支的現象，後來蔣總司令到石家莊督師，我軍士氣倍旺，晉軍乘勝進取紫荆關，白崇禧指揮的部隊又從京漢路正面逐走奉軍，以五月三十一日佔領保定，這一來由所謂保安總司令復改稱所謂大元帥的張作霖，只得以十七年六月三日倉皇出關，北伐的戰事，也告了一個大段落。

張作霖於六月三日出關，四日下午五時到達瀋陽的皇姑屯，某方早已預備的炸彈即於此時爆發，結果除炸死張作霖以外，還炸死到皇姑屯迎接張作霖的黑督吳俊陞。某方所以要炸死張作霖，是因為怕張作霖在平津失敗之後，國軍會追到東三省，東三省如由國軍佔領，某方以東三省為殖民地的企圖便不易實現，故急乘張作霖敗退出關的當兒，炸死張作霖，使東北不待革命軍的侵入便因張作霖之死陷於混亂的狀態，而某方則乘機以保僑為名，出兵佔領東北，償其多年的宿望。但某方的企圖雖然是這樣，然因為張作霖死後，奉軍中人都深知某方的陰謀，不肯自亂其陣容授人以隙，就無從實現其企圖，只能依舊再採取一種待時而動的姿勢。

某方既炸死張作霖，又採一種待時而動的姿勢，奉軍中人的不安自然是日益加甚，因此，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便毅然決然自動易幟，正式表示服從國民政府，於是中國的統一便告了實現。

雖然這次的統一止是形式的統一，在統一之下仍有許多不統一的事實，然自袁世凱稱帝以還，中國的形式統一，這一次還算是第一次，所以這次的統一縱是虛偽的統一，也是民國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可寶貴的紀錄。

在形式統一完成之中，朱、毛、彭、黃、賀、葉等方到處煽動農民暴動的風潮，楊森、劉湘正對峙於川中，已使這形式的統一受着事實的譏嘲，加以十八年湘變的突起，武漢軍隊的異動，兩粵的齟齬，²³馮玉祥的組織護黨救國軍，唐生智、石友三的變動，十九年擴大會議的糾紛，於是便連形式的虛偽的統一，也無法保持，終於招致了二十年的九一八的外侮。

上面的湘變，武漢異動，兩粵齟齬，馮玉祥護黨，唐、石的變動，擴大會議之役，可說是一個體系的幾方面。因為他的出發點全由於武漢政治分會的不與中央合作。

現在先談湘變：武漢中央十六年雖併歸南京，但仍設置政治分會，形成別一系統的政治會議。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武漢政治分會突免湘主席魯滌平之職，代以何鍵，並由夏威、胡宗鐸派隊入湘，實行驅魯。國府對此，即着蔡元培、何應欽、李濟深等查辦，查辦結果，以分會主席李宗仁事前並未與聞，未予處分，但免去當時與議的幾個政治分會委員之職。這原是一種避重就輕大題小做的處置，在中央實已煞費苦心，但在武漢方面卻認為是中央將有軍事行動的預兆，有採取軍事行動來抵抗的必要，由是湘變便又轉為武漢與中央的正式衝突。

正面衝突既起，白崇禧宣布成立第四編遣區，李宗仁則委何鍵、葉琪、夏威、胡宗鐸、陶鈞為五路司令，決以武

力反抗中央，國府不得已也就下令討伐，着劉峙、顧祝同、蔣鼎文、繆培南、王均、方鼎英、夏斗寅等會同海軍，進攻武漢。四月一日，中央軍克黃州，海軍於其翌日克劉家廟，夏威所部李明瑞投誠，餘衆退通城，何鍵亦就中央所委四路總指揮之職，通電擁護中央，至是武漢派纔退出武漢，而結束了鄂湘獨立自主的局勢。

武漢戰事開端的當兒，在廣州的鄧世增、黃紹雄，即主張響應武漢，一面設前敵總指揮部於廣州，一面回桂調兵，幾乎使廣東也捲入反中央的漩渦，但幸因陳銘樞、陳濟棠、蔣光鼐、陳策等，都不以廣東牽入漩渦為然，桂軍乃暫行離粵。但桂軍雖離粵，旋又因李宗仁、白崇禧的回桂，有重入廣東的企圖，中央當即命何鍵、陳濟棠、龍雲，分途討桂。惟中央討桂，桂軍則積極侵粵，故廣西的桂林、平樂等地，雖為湘軍所佔領，而廣東方面則除德慶為桂軍佔領外，在東江的徐景唐部隊及在廣州水面的中山、江大等艦，亦受桂軍的煽動，同時叛變，幾使廣東全省為之動搖，所幸粵省頗善於應付，故桂軍在侵入清遠、三水間的白泥以後，終遭粵軍的迎頭痛擊，只得退回梧州。延至十八年五月二日，俞作柏的部隊會同粵中空軍海軍佔領梧州，李宗仁、白崇禧出走，中央以俞作柏為桂省主席，桂事纔告一段落。

然桂事甫告一段落，桂省內部即發生極大的變動，又予李、白以復起的機緣。李宗仁復起之後，日以備戰為事，並於十九年六月，響應閩錫山，就閩氏所委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之職，率兵侵入湖南，攻陷長沙、岳州，後雖經中央軍擊敗，退保桂省，然在去年年底接受中央命令之前，還是保持一種獨立自主的狀態，直到去年「抗日救國

軍」的名義取消以後，桂省纔成爲中央命令所及的一省。

和武漢之役、粵桂之役有連帶關係的，當首數馮玉祥組織護黨救國軍之役。此役本有發生劇戰的可能，但幸中央應付得宜，一面請閻錫山主持，召開太原會議，商和平解決的辦法，一面則着唐生智、方振武向隴海西進，劉峙由湖北入豫，劉鎮華向潼關、紫荆關發展，馬廷勤由寧夏攻其後方，鄧錫侯、田頤堯由四川阻其南下，準備於不得已時，實行武力的解決。馮玉祥因形勢不利，乃接受十日內出洋及所部歸閻錫山改編由國府加委的條件，而軒然的巨波，也就幸告無形消滅。

不過護黨救國軍的風潮雖隨太原會議的閉幕，歸於消滅，而唐生智、石友三的異動，卻又起了平地的風波。唐生智本是奉命討馮的，但在馮氏護黨救國軍問題解決之後，唐竟宣布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之職，突然稱兵，石友三也忽然率部在浦口譁變，將援粵的餉械，作爲反抗中央之用。雖這兩支叛軍，後來都因當局的應付得宜，不曾闖出大禍，然也會動了好幾省的兵，蚌埠及平漢線一帶地方的人民，又嘗了一次兵禍的滋味。

唐石之變甫平，擴大會議的戰雲又起，閻於十八年八月被推爲擴大會議的國府主席之後，又於十九年三月十四日由第二、三四各集團軍將領擁爲總司令。其作戰的陣容，是以李宗仁爲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由廣西分向粵、湘進展，以馮玉祥爲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向河南進攻，閻自兼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指揮河北軍事，以石友三爲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由豫侵魯。中央方面爲應付這非常事變起見，就也委韓復榘爲第一軍團總指揮，由豫退

魯防守魯西之線，以劉峙任第二軍團總指揮，防守徐州、碭山一帶，以何成濬任第三軍團總指揮，防守平漢線、許昌一帶，以陳調元爲總參謀軍團總指揮，擔任黃河南岸軍事，以何應欽爲武漢行營主任，主持鄂湘軍事。戰事於五月十一日發生，直到九月二十二日閻、馮下野，擴大會議消滅，纔告段落，歷時凡四個月又十二日，雙方損失之鉅，都打破了歷來戰爭的紀錄。

擴大會議之役結束以後，大家盼望統一的情緒，雖熱烈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但到了二十年的五月，卻又因胡漢民先生對於約法問題的提議，未爲中央所容納，引起了粵、桂攜手共同反抗中央，自成黨部自設政府的不幸事變。雖中央對於這次事變，曾決定付諸政治解決，並未佈置軍事，但共匪卻乘着這個事變，粵決裂的機緣，擴大了佔領的區域，同時日本也認爲佔領東北的良機已到，發動了九一八的事變。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一致對外的呼聲響徹雲衢，於是寧、粵雙方乃以十月十八日在滬舉行和平統一會議，以下列的原則爲統一的前提：（一）對外採一致的行動，（二）京、粵同時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同數的中委，（三）因黨爭而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律恢復其黨權。和議定後，雙方乃均以十一月間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由中央選任林森爲國府主席。後來雖又因對日問題雙方意見略有參差，致上述條件也不足以促成真正的統一，然貌合神離的局面，終胡漢民之身未嘗稍改，就也可說是這一次和平統一會議的最大收穫。

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年，即民國二十一年，又有一二八的事變，和三月日本造成傀儡的「滿洲國」，國難嚴

重寶已到達頂點。是年雖仍有山東韓復渠和劉珍年的衝突，四川劉文輝和劉湘、鄧錫侯等的爭鬭，但均以國府處置得宜，不會釀成大禍。

二十二年一月，日軍佔領榆關，二月，日軍三路攻熱，三四月，關內的灤州，和察北的多倫，及長城各口相繼陷落，平津亦在日軍的包圍中，當局爲着保全平津，不得已乃忍辱負重，核准塘沽協定，然馮玉祥、孫殿英、陳銘樞等則先後用抗日的名義，在察綏、福建實行異動，就中馮玉祥的異動是在六月，曾聲明專爲抗日而來，別無他圖，所以經過若干次的調人調停之後，馮本人便宣告下野，退隱泰山，僅隨馮舉事的方振武、吉鴻昌，不允罷休，直到十月纔歸於平靖。至於孫殿英原是和陳銘樞有勾結的，後來因陳銘樞的人民政府不到兩個月，便告顛覆，也就無能爲役，而徐歸消滅了。

當陳銘樞、李濟深在閩叛變的時節，除卻孫殿英以外，還有若干不逞之徒準備響應，形勢可謂嚴重已極，所幸廣東的胡漢民先生，始終不以陳、李的行動爲然，兩粵都沒有舉動，而中央軍的戡亂又極迅速，那些不逞之徒，也就無所施其鬼蜮的技倆，假若當時胡漢民先生不持反對的態度，兩廣也成爲人民政府的支持者，那前途的形勢，或竟不堪設想了。

閩變戡平以後，中央舉全力來剿江西的共匪，卒於二十三年秋間，把盤踞江西的共匪擊潰，軍隊並追蹤入川力剿，共匪雖曾潰逃到滇、黔等省，但最後則竄入陝西，並且全部的人數也只剩八九萬左右，如果沒有去年的

西安事變，這八九團共匪實不難全部肅清，不幸適在聚殲殘匪計劃將告成功的前幾天，忽又發生了出人意表的西安事變，於是這八九團殘匪，又得到可以改頭換面的機會，而終以收編幾團結剿匪之局。這在一方面說，功虧一簣，實在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但在另一方面說，共產黨的所謂『紅軍』即赤匪，經此機會，可以表示其輸誠中央之意願，而勦匪的武力，一轉移間，可以用以抵禦外侮，同時，全國上下一致團結，和擁護領袖的精神，因此可以充分表現，實在是一件轉禍爲福的大關鍵。

西安事變的前夜，本有兩廣的異動，當兩廣異動平息之日，誰也不料還有性質比兩廣異動更嚴重的事變發生，更不會料到事變的主角是父仇未復國恨未消的張學良。在這次的事變中，我們得到很可寶貴的認識。認識是什麼？第一：在領袖蒙難期間，舉國民衆情緒的沉鬱和領袖安抵南京以後，舉國民衆的歡欣鼓舞，充分表示了舉國民衆已公認領袖的一身實繫全中國的安危，並充分表示舉國民衆對於假借任何名義實行犯上作亂的人物的厭棄。第二：像張學良、楊虎城這樣驕悍的人，還不得不信服於領袖的偉大人格之下，那就可見領袖的人格感化力，實遠在任何力量之上。第三：張學良這次發動事變的口實，和人民政府主持人，兩廣異動主持人，暨吉鴻昌、孫殿英以及共產黨發動事變的口實完全相同，均以抗日救國爲前提，一若指明中央爲不抵抗者，但其結果則舉國民衆的同情卻會集中於領袖的一身，由此可見抗日救國的口頭禪，實不如抗日救國的鐵一般的事實，而今日舉國民衆了解事實勝於雄辯的程度也大有可觀了。

此外，我們還有必須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上面所述國民黨的勝利和中央的勝利，並不是單純武力的勝利，而是統一運動的勝利。因為不統一便談不到一致，不能一致國力也無從集中，國力無從集中便談不到對外，所以舉國民衆莫不以內求統一爲外求自立自衛的前提，而國民黨和領袖平日的所爲都恰如舉國的願望，所以國民黨和領袖的一切行動，都能成爲舉國一致支持的行動，而收無攻不克、無役不勝的效果。

還有一層，統一本身就是力，統一本身就是抗敵。中國能夠真正統一，便有真正偉大的力，而中國國力的增長，也就是中國打擊敵人力量的增長。所以這十年間封建勢力的崩潰和共產黨的消滅，以及黨爭的逐漸廓清化，都可說是對外的勝利。這也是我們所必須深切認識的一點。

四 結論

本來在敘述黨務政治的統一過程以後，還應敘述幣制統一、軍事統一的過程，但因爲這兩者的改革都很簡單，前者以二十四年年末的改用法幣爲其核心，結果是從中外金融資本家手裏奪回財政的金融的支配權，其有裨於國計民生是不能以數字表示的；後者是以歷年的統一編制、統一經理、統一指揮、統一訓練爲核心，其結果是從私人手裏奪回國家的軍權，使早已形成爲私人爪牙的軍隊，化爲國家的或國民的武力；所以只想在這裏略述一二，以免詞費。

上面已經說過，現階段的中國，是雖不十分完全而大部分確已真正統一的國家。這種國家不能說完全沒有力量，但也不能說是已有充足的力量。因為國家的各部分是不可分的一體，各部分的力量都是國家的力量，要使國家發生充足的力量，就必須先使國家的各部分都能夠保持真正的統一，目前中國統一既還不十分完全，那中國就也不會有十分充足的力量。至於保持各部分統一的辦法，當然是以各部分的一切都能聽命於中央為前提，尤其是軍權須統一於中央之下，纔談得到聽命，如果口裏儘管說聽命，事實上還是把軍隊當做私人的保鏢，那就縱令是聽命，而其聽命的意識形態，也還是封建軍閥自稱聽命的意識形態，不僅談不到真正的統一，甚且也談不到形式的統一。現在我們希望各地方的長官，不再存着擁兵自固的心理，趕快交出地方所不應有的軍權，然後進而做到下列三點：（一）地方軍人不干涉應由中央主持的政務；（二）軍隊可以隨時由中央調防；（三）軍隊可以隨時調動軍官。軍隊沒有了地方或個人的系統，自然不復成爲國家統一之梗了。

軍隊之外，最需要統一的是外交，外交如果不由中央全權處理，定會發生意外的危險，目前若干的地方長官，往往把外交事件當做「地方事件」來解決，採一種不俟命而行的態度，這種態度大有埋下不測禍根的可能，萬萬不宜輕於嘗試。

此外國防的設施，也必須統一於整個國防計劃之下，纔有絕對良好的效果，否則爾爲爾我爲我，彼此各防其所防，以言省防則可以言國防則不可。目前若干地方，也許有把省防當做國防的事實，我們希望此後的各省，

不再幹這種勞而無益並且使人懷疑其另有割據企圖的事。

最後，中國目前既尚未達到真正完全的統一，則不能不用民衆的大力來促成牠來鞏固牠。民衆究竟怎樣可以幫助中央政府避免戰爭而達到和平統一呢？我在從前所寫的『統一與和平』一文裏曾經提出左列三點意見，現在摘要複寫在這裏，作為本文的結束：

(一) 發揮輿論的權威。由於已往事實的昭示，如兩廣事變的解決，西安事變的轉機，都可以看出全國真正輿論的威力。真正的輿論決不產生於自命爲左派的幼稚病者；也決不產生於自命爲右派的狹隘病者。真正的輿論，完全發生於全國無黨無派最大多數的民衆所有的常識和正義。兩廣事變，儘管陳濟棠輩假借什麼好名義，全國莫不嗤之以鼻，而陳乃不得不走。西安事變，儘管張學良輩標榜什麼好名義，全國莫不疾首痛心，而張乃不得不服罪。語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如果我們民衆絕不自暴自棄，一秉其爲國家爲民族而所持的常識與正義，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發揮其至公至正的輿論，則論鋒所及，對於任何野心軍閥和惡意政客所玩的破壞統一的陰謀，必能始終予以最嚴厲的打擊；其嚴厲的程度，豈但十目十手而已？輿論既有如此效用，實在可以算得國家走上民治化和現代化的大道上一個重要的推動力，不但民衆應善爲發揮，即政府亦應倍加愛護。愛護之道，例如：時時將政治演進的情勢和國家政策的方針，直接的或間接的通知社會各階層領導的人們，使他們相當明瞭以後，議論不致錯誤。此其一。在不違背建國最高原則，不詆毀中央最近國策的範圍以

內，儘量寬放言論自由的路，使民意藉以宣揚，下情得以上達，發揮善意的批評，淘汰惡意的誹謗。此其二。同時，在此非常時期，對於危害國本，反抗政府，麻醉青年誤入歧途的漢奸刊物，不問其受何種帝國主義的嗾使，自應一律斷然取緝，俾不復爲害羣之馬，須知禁止危害的言論，即所以愛護純正的輿論。此其三。果能政府與民衆一致重視公正坦直的輿論，不但任何軍人政客不敢再冒大不韙以破壞統一，即國家的民治基礎，亦將很堅固的建築起來。

(二) 完成法治的機構 中國必待統一完成而後可躋於現代國家之林，誠然，但現代國家的起碼條件必是一個法治的國家，英、美、法等國無論已，即如蘇俄以無產階級專政而建國的，現在也論起法治來了，不但有他們的憲法而且有新憲法，至於制裁他們幹部派所謂的反動份子，也無不假手於法庭。又如意、如德的所謂法西斯國家，如日本的傾向於法西斯國家，也都有他們的憲法，並且都辯護他們的政制是最合於民治精神。日本的軍部幾已橫衝直撞，無所不爲，然二二六事變之後，不能不繼之以法律的『肅軍』。故要做到國家的和平統一，非盡力提高法律的威信不可。但如欲實現法治，則完成法治的機構必不可緩。下列各端，都應限期實踐：(一)召集國民大會頒布憲法，斟酌國情，規定施行日期，使全國上下共同誓守此根本大法。(二)各省市分別加緊推進地方自治，使民治的下層基礎鞏固。(三)各級法院的系統機構，應在短時期內整理完成。(四)各級法院的檢察制度，應力求完滿，使檢察官能充分行使職權，代表國家檢舉一切犯罪事件。(五)各級政府用人，遵

守考試銓敍的法規，俾得人盡其才。（六）釐定政府各機關的權職，許其分工合作，防其越職侵權；在非軍事區域內，對於現役軍人干涉地方行政，尤應懸爲厲禁。

（三）加速經濟的建設。以中國之廣土衆民，而欲鞏固統一，首先非有四通八達的鐵道網、公路網、航路網、電信網不可；故鐵路、公路、航運、航空、郵電及電播等各種交通事業的建設，在最短時間，應用全民衆的力量，幫助政府迎頭趕上。交通發達，勢必產生真正的統一。其次，必使貨幣政策，穩定推行，農村復興，工業發達，然後國民的經濟生活，可望脫離封建時代的形態，而達於工商業資本時期的國民經濟階段，構成一整個經濟單位。一般國民的經濟生活，如果因民族資本的經濟建設而促成其聯繫，則榮枯相共，利害相同，各省市的民衆在物質生活上必然確立了親愛精誠的基礎，其擁護統一的力量，斷非任何勢力所可搖動的了。

總之，「統一」是中國目前的第一需要；「和平統一」尤其是中國目前的普遍希望。我們既在十年之間，以無量的犧牲代價，換得此全國和平統一之局，我們民衆必須用全力來保持。論語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我現在可仿照說一句：「民衆欲統一，斯統一矣；」「民衆欲和平統一，斯和平統一矣。」

十年來的中國政治建設

薩孟武

十年來的中國政治可以說是完全致力於民族國家的建設。民族國家對內是統一的，對外是獨立的，所以十年來的中國政治建設，其目標不外兩種：第一對內要剷除封建軍閥的割據，而致力於民族統一運動；第二對外要脫離帝國主義者的羈絆，而致力於民族獨立運動。

內亂可以引起外侮，這是誰都知道的。在中國歷史上，內亂——割據反覆不已，所以外侮也時時發生。何以中國時時發生內亂割據呢？主要的原因為經濟組織，附帶的原因為政治制度。中國是農業國，而中國的農業卻甚幼稚，技術的幼稚已經可以妨害生產力的發展，而小農經營又使技術不易改良。其結果，農民當然沒有貯蓄，而致再生產只能在同一規模上不斷的反覆着，然而地力是有限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種，收穫何能不年年減少？一方收穫年年減少，他方人口年年繁殖，所以經過數代之後，往往因為物的生產過少，人的生產過多，發生了人口過剩的現象，數百萬的農民淪落為流氓無產者，而使軍閥有雇用傭兵的機會。同時農業社會又很容易發生割據的形勢。因為農業與商工業不同，商工業需要市場，市場愈大，商工業資本家的利潤愈多，他

們爲了開闢國內的市場，常要求國家的統一。反之，農民則跔躋於一地之內，保守性甚爲強烈，鄉土觀念超過於國家觀念，他們喜歡維持當地的方言，致國語不能發達成爲結合全民族的紐帶，至於風俗、習慣、貨幣、法制也隨各地而異。這種情形對於封建軍閥的割據，當然是有利的。

經濟組織已經可使軍閥有割據的可能，而政治制度又可以產生軍閥。何以呢？中國自秦、漢以來，地方行政制度雖然每代不同，但是卻有一種共同的特徵，地方長官如漢的州牧（或州刺史）、晉的州都督、隋的郡太守、唐的道節度使、宋的路監司、元的省丞相、明清的省總督均與中央大臣立於平等的地位，地方長官關於地方政務，得直接上奏天子，經天子裁決之後，中央大臣就莫如之何。中央大臣對於地方長官既不能發布命令，又不能取消其處分。中央大臣關於其專管事項，要對地方長官發布命令或取消其處分，必須上奏天子，用「聖旨」傳給地方長官。即地方長官乃直接受天子的支配，而不受中央大臣的監督。這種制度已經可以養成尾大不掉之勢，何況地方長官又常握有軍事上、行政上、財政上各種權限，儼然成爲獨立的諸侯，所以一旦國內發生變動，他們就可脫離中央而獨立。

民國以來，軍閥割據各省的原因，大約如上所言，但是近年以來，在中央方面，在地方方面，均有各種要素，迫使軍閥沒落。

政治不能離開經濟而獨立。在古代，關中乃如張良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邦能够得到天下，就是

因為先入關中，據爲已有；而漢、唐兩朝都是利用關中的富庶，以統治全國。宋、元以後，關中漸次沒落，南方漸次富庶，但是經濟尚未集中。且北方爲平原之地，易於統一；南方山河險阻，不能團結，以南方的一省絕對不能敵過北方全部。因此之故，誰能取得北方，就可利用北方整個的勢力，派兵南下，將南方各省一一打破，這便是歷史上北方控制南方的原因。

但是到了最近，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移向長江以南了；而長江南部各省的金融又集中於上海。這個時候，誰能控制上海，誰就能控制全國。孫中山先生看破這一點，所以主張定都南京。因爲上海本身爲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不能以之爲國都，同時南京與上海距離不遠，政府若能稍施政策，就可駕御上海，更利用上海的經濟勢力，以統治全國。

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公債政策」。從前北方政府均募外債，外債在一定條件之下，可使借債國與貸債國發生密切關係，貸債國勢須援助借債國，大戰以前，法、俄兩國的關係就是其例。但是這種理法不能適用於中國，外國有政治力做後援，不怕中國倒債而中國因爲借債外國，反須受外國牽制，所以北方政府的公債政策可以說完全失敗（固然當時無所謂政策。）反之，國民政府的公債政策卻完全成功，何以呢？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不借外債，只借內債。在中國買公債的，不是一般人民，乃是上海的金融界，一旦國民政府失去威望，公債亦將失去信用，不但利錢沒有，連元本也有喪失的危險。上海金融界爲了自己的利益，在事實上已經迫到不能不擁

護國民政府。這樣國民政府就可以利用上海的經濟力，以統治全國。

然則國民政府的基礎只築在上海金融界上面麼？不，一切革命是先有破壞，而後纔有建設的。在破壞時代，革命黨惟怕社會不亂，因為社會不亂，革命黨沒有機會得到政權，因之，也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反之，革命黨在既得政權之後，最怕的是社會紛亂，因為社會紛亂，無法建設，因之，也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國民黨的理想在於實現三民主義，而在目前，則為民族的統一與獨立。這個目標是全體國民共同一致的目標，誰都不敢反對，也不能反對。最近國民政府由於蔣委員長的努力，對於這個目標已經實現一半了。政黨的理想成為兌現的紙幣，那末，當然能够得到全體國民的擁護，而使國民政府的基礎由上海金融界擴張到國民全體之上。

要維繫民心，只用精神力是不够的，尚須利用物質力。「法幣政策」在政府不過為了穩定匯兌，增加中央的財力，然其結果，又復迫使全國人民不能不擁護國民政府。何以說呢？自法幣政策實行之後，現銀收歸國有，從前人民尤其是農民所有的，非紙幣，乃是現銀。現在現銀換了紙幣。紙幣的價值是以銀行的信用為標準的，而銀行的信用則由於公債政策，繫於國民政府的安定與否。這樣一來，全國人民為了愛護紙幣，不能不愛護銀行，又爲了愛護銀行，不能不愛護國民政府了。

在中央，已經造成統一的基礎，在地方，軍閥又成爲強弩之末，日暮途窮。何以言之？中國財政乃以關稅、鹽稅與田賦爲主要的收入，關、鹽兩稅因爲外債關係，自昔已歸中央所有。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只有田賦。軍閥的基

確是放在傭兵之上而養活傭兵的財源則依靠於田賦。現在農村日益破產，田賦日益減少，由是封建軍閥在經濟上失去獨立的資格而須依附中央，而最近中央又由法幣政策，忽然增加了許多財力，其能壓倒地方，可以說是勢之必然。

以上所述不過說明中國已有統一的基礎與趨勢，誰敢反抗統一，誰就要覆沒。至於怎樣能够把「統一」發揚光大起來，而成為民族獨立，尚須有待於其他政策。

我會說過統一是需要領袖的。孟子說：『定於一』這個「一」字就是領袖。領袖必須實行那一種政策，而後能够統一全國呢？曰：須施行王道——仁政。甚麼叫做王道——仁政？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乃繼承孔子的教義，上述孟子的話就是孔子所謂『富之』、『教之』。不過孔子只說明大綱，孟子則詳述其政策而已。這種政策可以分做兩種，用現代話來說：一是經濟政策；一是教育政策。前者所以使人民足衣食，後者所以使人民知禮義。秦用商鞅之計，施行新經濟政策，廢井田，開阡陌，家給人足，秦人富強，所以到了始皇，就能統一中國。不過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關於民生問題，竟然不顧，徵發農民建築萬里長城，農民既須從軍，田園當然荒蕪，於是社會上就充斥着流氓無產者，同時始皇關於民教問題，更設施失措，所以始皇一死，農民就羣起暴動，而秦祚亦因

之告終。

富與教爲復興民族之本。怎樣富民？這是物質建設。怎樣教民？這是心理建設。最近蔣委員長關於富的方面，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關於教的方面，發起新生活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目標，在於增加生產總量。新生活運動的目標在使人民明禮義知廉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民族復興端賴乎此。

總而言之，最近十年以來，一方割據軍閥有沒落的必然性，同時中央政府因施行政策得當，所以國家的統一日益鞏固。發展交通，可以縮小全國的面積，使國家容易統一。改良生產，可以增加人民的富力，使其安居樂業，普及教育，可以促成民族的覺醒，便知抵抗侵略，這三種政策，現今中央政府已經着手進行了，最後的問題只有民族的獨立。獨立是由統一而來的，就是由於政治修明，產業發展，教化進步而來的。我相信全國人民若能站在唯一領袖的指導之下，不好高不騖遠，實事求是，各盡己能，中華民族不出五年，必能復興。

這篇論文雖然只有理論，沒有實例，然而最近十年來的中國政治建設之理論的基礎，可以說已盡於此。至於實際建設，在本專號上，已有專文討論，可不必畫蛇添足。

十年來的中國外交

吳頤皋

一 緒言

最近十年來之中外關係，異常錯綜複雜，然在其演變之過程中，吾人仍得以九一八事變為關鍵，劃分作兩個階段，九一八以前中國之外交，其主要目標為取消不平等修約，可稱為修約運動時期。從九一八以後到現在，中國外交無疑的是以對日為主，經過許多曲折與變遷，似乎已由消極而轉向積極，漸漸踏入自主外交的理想園地之中。

當前一期的開始，國民革命軍正誓師北伐，民族解放運動，日趨光明，當時革命勢力的迅速發展，使各國尤其是英國不得不改變其對華之態度，漢、滬、英租界的收回，便是一個外交上的收穫。

迨十七年間，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由破壞而入於建設時期，對外關係，亦有新的開展。以關稅自主及恢復法權為中心的修約交涉，正式開始，結果關稅自主，得以確立，法權交涉，方粗具頭緒而賴朋事件發生，無形中受一

極大打擊。至瀋陽事變，外交形勢不然一變，法權交涉更無法進行。

九一八之瀋陽事變，打破遠東的均勢局面，激起國人的愛國情緒。從那時候起，——中日兩國間的關係，始終在緊張危險的狀態中。當事變突發之際，我天災人禍交迫而至，民力凋蔽，國步維艱，不得已而出於申訴國際之下策，希冀國際間作正義的制裁，而軍事外交，遂處處陷於被動的地位，應付不易。及一二八滬戰發生，敵人之侵略，益無止境，那時候中樞負責當局始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期在艱苦的境地之中，保全國脈，徐圖復興。塘沽協定之後，政府與人民要於國聯制裁之無效，國際協助之無望，始悽然於外力之不足。特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汪蔣聯名通電，宣布救國方策謂「治本莫要於充實國力，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此後政府即努力於生產建設，充實國力。經過三四年不斷的工作，對內統一告成，對外發言有力，外交方面的陣容與形勢，較前判然不同。

二 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的中外交涉

國民革命軍自十五年七月出師北伐，十月即克復武昌，基礎漸固，遂引兵東下，進窺江浙，革命勢力的發展，引起各國深刻注意，蓋國民革命之目的為實現中國之自由平等，不僅要消滅封建勢力，同時更要排除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此種反帝國主義之運動，反映在外交方面，不容說是態度強硬，主張激烈，在外人目光中視之，這顯然是個新的局面。